

東吳大學

東吳歷史學報

第十期

抽印本



東吳大學出版
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
臺灣 台北

洪長泰，《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》

臺北：一方出版有限公司，2003。xix + 340 頁。

林志宏*

一、

這是一本論文集。書中各篇文章分別已先在中、英文的專書或期刊中發表過（詳該書頁 330-331）。作者嘗試於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圖景上，時間鎖定在一九三〇到五〇年代初期，以新文化史的手法來探討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的變化。全書一共收錄有九篇文章，各篇以漫畫、木刻、說書、歌曲、報章、節日慶典及紀念碑等「文本」（text）做為題材。

眾所周知，新文化史研究取向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，在西方史學界引領風騷，至今也面臨到各種反省與批判，思考著如何進一步來轉向或超越。¹作者看法以為：新文化史因為強調研究歷史的動態，那麼「文化」的面向是既複雜且互動的，所以需要利用各種材料和其他學科的知識做為研究策略，才能進而瞭解歷史中更深層的意義。對作者來說，新的材料宛如「替

*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、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。

1 目前這方面思考的最重要著作，當屬 Victoria E.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., *Beyond the Cultural Turn: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* (Berkeley and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9). 相關討論另可見：蔣竹山，〈「文化轉向」的轉向或超越？——介紹四本論歐美新文化史的著作〉，《新史學》，第12卷第1期（2001年3月），頁233-246。

二十一世紀的史學研究打開了另一道大門」（頁 xiii），將有助於探索文化本身多樣的面向。本書不啻嘗試借鏡新文化史所發展的研究角度來重新檢視中國政治，也希望開闢以往史家所忽略的材料，達到更近乎全面釐清歷史面貌的途徑。

此外，本書還以政治文化（political culture）為主題出發。關於「政治文化」，我們都知道，自一九五六年 Gabriel Almond 首次提出後，²迄今仍為政治學研究中相當重要的議題。本來這項理論的創發，乃是針對二次戰後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選擇民主政治道路，從傳統走向現代社會之過程裡所提出的種種價值與批判，並且檢驗的標準取自西方（特別是歐美）國家實施民主政治的成果和經驗。不過，隨著世人對民主政治有著更深刻地體認，有關政治文化的討論不再侷限於現代化理論框架，也日趨擴張到其他學科的研究，尤其是西方史學。儘管政治文化的定義直到現在依然眾說紛紜，可是歐美史學界對此一概念向來極為關注，³如今這股風氣也逐漸在近代中國史的研究產生效應。⁴而本書主要貢獻，即是帶給中文史學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。根據作者說法，他對政治文化所採取的是普遍的看法，係「社會中大家共有的政治態度、信仰和感受」（頁 262）；換言之，即是關於民眾對政治所採取的情感和傾向，以及這一心理態度最終所導致出來的影響。

書中第一章到第四章利用圖像資料來討論通俗藝術的影響力，並放在社會、政治的脈絡中來理解。前面三章是以漫畫做為題材。經由分析豐子愷（1898-1975）到廖冰兄（1915- ）的漫畫作品裡，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全新的公共輿論方式出現，即透過漫畫的呈現，來表達對國共內戰期間政治

2 Gabriel A. Almond, "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," *Journal of Politics*, 18 (1956): 391-409.

3 特別是法國大革命，許多學者研究自稱是依循托克維爾（Alexis de Tocqueville）思維來討論，將革命和啟蒙放在文化的脈絡來思考。見：Dena Goodman, *The Republic of Letters: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* (Ithaca and London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94), pp. 300-304.

4 譬如：英國學者 Henrietta Harrison 討論民國國民的塑造，便是藉由國慶日儀式、衣著、髮型等面向分析政治文化及意識的形塑。見：Henrietta Harrison, *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: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, 1911-1929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0).

的不滿與失望。「漫畫」原來只是現代化的城市中所產生的一種視覺藝術，它和傳統繪畫的目的、功能不同，非但要表達製作者自身意念，也因為受到現實市場和讀者間供需關係，而形成另一種公共發聲的管道。不過，本書作者也藉著廖冰兄的話，預示著藝術對政治的影響力正在中國逐步地衰微（頁 69）。

第四、五章集中討論有關中共對民間藝術政策，尤其是藝術政治化的發展。這裡分別以古元（1919-1996）、韓起祥（1915-1989）為例，分析他們的作品如何被納入做為宣傳的利器：如古元的鄉村版畫以農民為題，結合年畫來傳遞共產思想；同樣韓起祥的《劉巧團圓》，歌頌中共在陝西邊區農村的改革，符合黨的路線。作者以 Michel de Certeau 的理論為據，⁵指稱文化的傳達、挪用與接受，結果並非本來傳播者所能預期，反而是在傳播、中介和接受的人三方面相互拉扯而造成影響的。所以，作者認為最終幫助了中共宣揚社會主義理念之功，並非汲引俄國教條，反倒是源於古老中國的本土藝術（頁 113；145-150；158-160）。這讓我們想到，後來中共在推行人民公社和發動文化大革命，有許多成分也同樣來自傳統的因素，⁶絕非無的放矢，有著相同經驗做為憑藉。

現代國家透過極權方式以達統治之效，政治藝術化自然是無法被忽略的一環。第六、八、九章作者提供了中共對戰爭歌曲、節慶與紀念碑的作法為例，說明其中塑造的過程。值得一提是，制訂節慶與建立紀念碑的目標當然希望要觸動民眾情感，喚起他們的歷史記憶及認同；但更重要的，歷史記憶可能只是某一世代或地區人們共同的印象，本身具有侷限性，若想要經得起時間考驗，藝術化的過程自然不可避免。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即為代表政治符號的顯證。作者在第九章〈寫在石頭上的歷史〉中告訴我們：這一紀念碑結合建築、歷史和雕塑而成，它不僅將文字與圖像交互使用，既具掌控歷史記憶的功能外，還要透過藝術來傳達政權的合

5 Michel de Certeau, *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*. trans. by Steven Rendall (Berkeley and Los Angeles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8), pp. xi-xxiv.

6 這方面討論可詳見：張灝，〈扮演上帝：廿世紀中國激進思想中人的神化〉，收在劉述先生主編，《中國思潮與外來文化：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哲學研究所，2002年），頁323-339。

法性意義。

如果說文化是一張意義之網，那麼在上述政治與藝術關係各篇研究中，作者認為這些「文本」所產生的意義，都將構築三〇到五〇年代初期中國政治文化上特色。不僅如此，這些特色同時還顯示：在國共內戰之下，傳統藝術形式、目的和功能正逐步歷經改良，成為戰爭時的另類武器，甚至還更具感染力，變成吸收廣大民心的因素。我們都知道，幾乎在同一時期執政的國民黨，其實也開始努力強化民族精神，做為鞏固抗日陣線的方針，⁷但兩造的結果竟是南轅北轍，社會主義獲得最後勝利。如此一來，本書不啻解釋整個三〇到五〇年代初期中國政治道路的曲折，也說明人們對政治上情感歷經了極大的轉變，促使中共得勢建國的遠因。

二、

以做為一本史學專著而言，作者對史料的掌握不可不謂用力甚深。試以第七章在討論范長江（1909-1970）及三、四〇年代的記者群為例，本書所採用的幾項材料，像是《新聞雜誌》、《報學季刊》或專書，都是當時的出版品，極為少見，可見資料蒐羅之勤。除此以外，作者也在一九九〇年前後花費了若干時間進行口述訪問，以資印證。另外本書還有如下的三項優點，值得稱許：首先，發揮了史料和議題的無限延展性。這點當然得力於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啟示。譬如有關對漫畫、木刻作品等的使用，反映了「非官方」普羅大眾的觀點，也強化歷史與藝術史兩者間的對話。其次，本書的文字通暢，並且結合影像圖片，在書中各篇文章隨處附上，讓讀者能有所對照，這在現今中文世界的歷史研究著作裡尚不多見。最後要介紹的是〈自序：新文化史的探索〉，我認為它不僅可視為本書導言，同時也是一篇對新文化史研究取向極扼要的介紹。讀者若想進一步瞭解作者

⁷ 這從中國國民黨在1938年4月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會中討論抗戰建國綱領，提出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可知。其中規定九項教育方針有謂：「對於吾國文化固有精萃所寄之文史哲藝，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發揚，以立民族之自信。」見：不著撰人，〈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〉，收在多賀秋五郎編，《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重印本，1976年），頁404。

對新文化史的定義和看法，不妨細讀此篇。

本書取材新穎，文字清新易讀，然仍有數項問題，值得我們來反思和商榷。其一，關於圖像、歌曲、節慶等「文本」資料，其中特殊性究竟該如何運用在中國史研究上，往往淺嘗即止，缺乏更詳盡的討論。如第二章〈憤怒的意象〉中，作者提到漫畫的政治影響力，不但創造了政府腐敗和官僚形象，也提供群眾表達自己不滿情緒的園地。但問題是漫畫這類的圖像語言透過印刷術發展，究竟能夠傳達多少民眾心聲？以及它做為諷刺政府的成效為何？作者不僅問了這項問題，並且也表示無從解答。誠然，任何來自文學、藝術等方面作品，想要運用數據來量化它們對政治的「影響」為何，都可能會面臨難以清楚回答問題的困境。本書中行文只說到漫畫「有助我們了解人民對政府的評價」（頁 62），這固然係想要把「文本」放入社會脈絡中的努力（見頁 xiv），卻另一方面顯示資料本身可能存在的侷限性。顯然如何正視這些文本所代表的符號體系和具體實踐間的差異，⁸是有待於日後我們繼續努力的部分。

其二，作者運用「文本」詮釋中國現代歷史，固然別出一格，可是未脫過去對一九三〇到五〇年代相關研究之視野與印象。例如中共對民間文化政策，承襲了一九二〇、三〇年代知識分子「到民間去」運動的啟示，直到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後，依舊不斷希望透過普羅百姓來建立無產階級的理想，這早已是學界共識。我們只能說，本書的貢獻係由這些特殊題材，豐富了既有研究基礎，然並未帶給我們不同以往的瞭解。

最後，追求歷史解釋和意義如果也是讀者的權利的話，那麼本書很可惜的是還缺乏一強而有力且醒目的標語（slogan），來凸顯其一貫性主題。儘管少了「結論」一章，對以論文集做為形式的本書而言並無影響，可是內容上卻略顯失焦，似乎很難窺見要將這些文章歸納在一起的理由。觀其書名「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」便可知，我們看到的只是時而精闢的小碎玉，但並無預見到那背後蘊藏豐富的玉礦資源。整體來說，本書勤隨西方史學

⁸ 這也是西方新文化史家目前所指出的困境和想要超越的部分。見：Richard Biernacki, "Language and the Shift from Signs to Practices in cultural Inquiry," *History and Theory*, 39 (2000): 289-310.

主流，用心值得鼓勵；不過，悟察本書短長，也讓我們在努力進行中國新文化史研究的同時，有必要去警覺「如何賦予新意」這樣的挑戰存在。

（本文責任校對：陳姿螢）

